

企业向银行借款,非营利性民办学院提供担保。借款到期,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法院依法判决——

学院存在管理方面漏洞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 河北法治报记者 李胜男

2020年12月17日,某公司与某银行签订了《企业借款合同》,该公司向银行借款4650万元,合同期限自2020年12月17日起至2021年12月10日,借款年利率为8.7%。

同日,某职业学院与某银行签订了《质押合同》,某职业学院以其学校收益权(十年学费、住宿费 etc 收费权)对某公司在某银行的前述借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某银行全部债权,并于2020年12月25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此次担保事宜并未经某职业学院董事会决议。

借款到期后,某公司未偿还借款本息。为此,某银行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某职业学院承担担保责任。

法院受理案件,经查得知,某职业学院系经民政厅于2020年3月20日登记设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范围为高等专科学历教育,业务主管单位为教育厅。该职业学院章程约定:董事会是该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院经费来源于开办费、政府资助、在业务范围内开展服务活动的收入、利息、捐赠以及其他合法收入。经费必

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盈余不得分红;剩余财产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职业学院属于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此次担保事宜未经某职业学院董事会决议。该学院存在管理方面的漏洞,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判决:某职业学院就某公司对某银行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赔偿责任范围以不超过实现应收账款质押的价值为限)。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民办学校。根据某职业学院提交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该学校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并未选择登记为营利性民办学校。根据该学院章程约定经费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盈余不得分红。而且学校终

止后剩余财产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处理。通过该章程可以看出,学校的出资人不享有学校的盈余分配以及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符合公益性目的。故,某职业学院属于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此次担保事宜仅未经某职业学院法定代表人韩某的签字,并未经某职业学院董事会决议。而对外担保事宜应属于决策机构的决定事项,某职业学院法定代表人韩某签订案涉质押合同的行为属于超越权限行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本案中,虽然某职业学院不属于法院管辖的范畴,但是在进行对外担保时,其和公司法规定的各种组织形式并无差别。而且某职业学院是以教育公益为目的设立的,其经费的来源除举办者出资外还有政府资助以及社会捐助等,故该学院对外提供担保事宜更应为学院决策机构共同决策的结果。

某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处理此类法人组织的对外担保事宜时,要比处理公司法人尽到更加谨慎的审查义务,而某银行并未要求某职业学院提供相应的学院章程以及决策机构的相关决议,某银行不属于善意

相对人。某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明知或应知担保人是 以公益为目的的民办学校,却不对学院章程以及相关决议进行审查,存在过错,而某职业学院亦存在管理方面的漏洞,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需要指出的是,某职业学院虽然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该赔偿责任的范围不应超过担保财产实现的价值,即某职业学院的赔偿责任范围以不超过实现应收账款质押的价值为限。据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以公益为目的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对外担保效力,应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可以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从而确立了该类纠纷的法律适用规则。从法律所要保护的利益来看,公司法第十六条重在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相对于公司股东,以公益为目的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对外担保有可能要损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如学生、幼儿、医院患者、老年人等群体的利益,该利益更需要法律给予特殊的保护。因此,该案判决对此类案件的依法公正审理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为准确适用法律,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司法实践样本。

格式条款怎样才算尽到提示义务?

□ 刘娟娇

消费者通过快递公司邮寄货物,运输过程中货物损坏,快递公司要按保价条款赔偿,消费者称快递公司保价条款为格式条款,未向其明示,要求全额赔偿货物,法院如何判决?

王先生委托快递员代其下单运送打印机,运费150元,打印机却在运输过程中受损。王先生主张保价等格式条款因未告知而无效,要求快递公司赔偿维修费3279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存在快递员代下单的事实,快递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快递员向王先生告知过保价条款等格式条款的内容,故网络订单中相关保价条款不能约束王先生,遂判决快递公司赔偿王先生维修费3279元。

王先生诉称,其通过网络购买快递公司提供的快递物流服务,支付运费150元,承运物品为彩色激光多功能一体机。该运单系快递员代其下单,对于制式合同中的保价条款,快递公司未向其告知,快递员亦未征求其保价意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格式条款具有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承运人应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故王先生主张快递公司赔偿其维修费3279元。

快递公司辩称,案涉运单的寄件人非王先生,因合同具有相对性,王先生与快递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法律关系,其无权向快递公司主张任何权利或责任。网络下单中的保价金额必须手动输入且以红色加粗字体提示,《快件服务协议》中的保价与赔偿规则亦以红色加粗字体提示,快递公司 对保价与赔付规则已经尽到合理的提示义务。故即便原告主体适格,损失赔付亦不应超过1000元。

最终,法院判决快递公司赔偿王先生维修费3279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且快递公司已自动履行判决确定的债务。

说法: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主体适格问题;二、损失赔偿问题。关于原告主体适格问题,本案中,王先生委托快递公司快递员代其下单,告知快递员取货地点与运送地点,并支付了相关运费。快递员代其下单后,快递公司完成运输服务,将货物运送至王先生指定地点。故快递员的行为应视为代表快递公司履行职务

行为,王先生与快递公司之间实际成立了运输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王先生作为实际托运人,有权以个人名义向承运人主张权利,法院对王先生作为本案原告进行本案诉讼的权利予以确认。对于快递公司辩称王先生非本案适格主体的主张,经庭审查明,寄件人系快递员代下单时随意取用的名字,对于快递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损失赔偿问题,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通常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明显标识,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按照对方的要求,就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对方作出通常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说明义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其已经尽到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对于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仅以采取了设置勾选、弹窗等方式为由主张其已经履行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其举证符合前两款规定的除外。

本案中,存在快递员代王先生下单的事实,案涉运单并非是由王先生本人操作填写并选择的保价行为。又因快递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快递员向王先生告知过保价条款等格式条款的内容和相关减轻、免责情形,故快递公司网络订单中相关保价条款不能约束王先生,本案应以实际损失为依据确定承运人的赔偿责任。

并造成了王女士精神上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王女士要求张先生删除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布的涉案两条信息,张先生虽辩称“现在该朋友圈的状态为仅自己可见”,但因朋友圈状态可见范围随时可修改,侵权行为仍未完全停止,故法院对张先生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张先生应立即删除其发布的涉案不当言论。王女士要求张先生在公开媒体上发布道歉声明,因该事件仅发生在张先生微信朋友圈内,在报刊上发布道歉声明一定程度上会扩大侵权的范围及影响,故应以张先生在微信朋友圈内发布道歉声明为宜,内容由法院审核。王女士要求张先生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综合考虑该事件的影响范围、张先生侵权行为过错程度等因素,法院酌定张先生赔偿王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法官提醒,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社交平台发表言论,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网络行为规范,切莫贪图一时口舌之快,最终害人害己。同时,在受到侵害时,也要拿起法律武器,合理维权。

白纸上签名惹上巨额债务官司

法官提醒:增强风险意识,不要随意在任何书面文件或白纸上签名

□ 李昂

崔某与王某签订《协议书》,约定王某作为中介促成崔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房产买卖合同》,崔某支付给王某服务费700万元。同时二人商议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上述700万元作为王某的出资。

《协议书》签订两个月后,崔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了《房产买卖合同》,约定崔某向房地产公司购买八栋房屋,支付购房款1000万元。上述《房产买卖合同》签订后,因崔某未支付购房款,合同未实际履行。随后,王某多次查询二人合伙开的公司是否设立,结果均显示无该企业资料,王某觉得自己被骗,遂将崔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崔某给付服务费700万元,并赔偿违约金205万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崔某辩称,原告王某给

法庭递交的材料都是假的。之前,原告王某提出欲与自己联合开设一家公司,因为自己经常 在南方,原告说为方便办理营业执照,让自己提前在七八张白纸上签字,自己当时也未多想就在白纸上签上名字。协议书是原告自己编造的,其自称为中介,但实际交易未履行,也不存在中介服务,所以原告王某提出的服务费根本就不存在。

法院最终作出判决,对原告提出的被告给付700万元服务费及支付205万元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说法:

本案中原告依据《协议书》向被告主张服务费700万元及违约金205万元,该《协议书》的内容虽然显示双方达成合意成立公司,但现实中无证据表

明该公司真实存在,而该协议的履行应以公司成立为前提条件。《房产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格为1000万元,而居间费用高达700万元,有悖常理。《房产买卖合同》的签订双方未实际履行,被告就此亦未获得任何收益,故依现有证据让被告承担高昂的居间费及违约金,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原则。综上,原告要求被告给付700万元服务费及支付205万元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提醒,一定不要在白纸上随便签自己的名字,不要给别人随便作担保,要严格掌握自己的人名章。在日常交易中,应增强风险意识,不能随意在别人的借条、欠条等借贷凭据乃至任何书面文件上签字,以免承担不必要的责任。如果确实需要在合同上签字,务必认真核对合同的具体内容。

朋友圈“吐槽”当心被起诉

案信息,并在其朋友圈发布对王女士的道歉声明,同时,赔偿王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判决作出后,原告均未提起上诉,本案现已生效。

说法:

公民拥有言论自由,但行使言论自由不能逾越法律边界,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网络时代,人们习惯通过“朋友圈”吐槽自己对某件事、某个人的不满,以此发泄个人情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所谓名誉权,是指公民或者法人保持并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如何认定侵犯名誉权,一是客观上存在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传播损害他人名誉的虚假言辞,并为第三人知悉,包括:以语言或行动,公然损害他人人格、毁损他人名誉,比如不当的言词评价、贬低和毁损相对人的人格,但不涉及“事实”的真实性问题;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破坏他人名誉;故意

披露、散布法律所保护的他人私生活信息。二是从主观过错方面来看,行为人存在实际恶意,并在客观上造成他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三是受害者应为特定的人,不管是行为人指名道姓,还是指桑骂槐,只要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能够确定被侵害对象,同样构成侵害名誉权。四是侵权行为给受害人名誉造成严重损害,使得受害人精神和心灵遭受创伤,尤其是公众对其社会评价降低,带来的不良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条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行为人拒不承担前款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负担。本案中,张先生出于个人情绪在微信朋友圈内发布侮辱性言论,指向性明确,该言论在朋友圈内引起了朋友的关注,客观上影响了王女士的社会评价,亦在微信朋友圈中对王女士产生不良影响,损害了王女士的名誉,应当认定张先生侵害了王女士的名誉

说法:

微信转账和微信红包均系通过微信软件操作付款,但应从微信软件的功能及属性上对两种付款性质进行区分认定。从微信软件属性来看,其本身作为社交工具,除具备日常沟通交流功能外还具备社交功能,微信红包是微信软件社交功能的典型体现。微信红包设置的金额上限为200元,且名为“红包”,根据我国的民间习俗,给付“红包”在通常情况下意味着自愿赠与、无需返还。同时,从我国的基本国情、民俗习惯、民众普遍的经济收入、支出水平考虑,无偿赠与200元及以下的红包是社会公众通常可以接受的金额水准。微信转账则与之不同,其仅是微信软件设置的付款功能,是社会主体之间常用的付款方式,不具备“赠与”之义。

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是,在双方同意通过微信红包和微信转账的方式付款的情况下,当付款的一方主张是提供借款,收款的一方主张是接受赠与,双方对于合同的内容存在不同理解时,应该怎样确定合同的内容?本案中,法官根据微信软件对于微信红包与微信转账的不同功能设计,结合人们对微信红包、微信转账的通常理解和使用习惯,以及周先生曾向刘女士借款还贷等事实,认定通过微信红包支付的款项属于赠与、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的款项属于借款。这实际上是综合利用文义解释、习惯解释等合同解释方法,并参考双方的缔约背景和履行行为等因素,来确定有争议的合同内容。这种做法与刚刚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正相吻合,也符合法理和人情。